

山西
财经
大学
学术
文库

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中国就业增长的
内生性、脆弱性和增长潜力研究

米子川◎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山西财经大学学术文库]



中国就业增长的内生性、脆弱性 和增长潜力研究

米子川◎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就业增长的内生性、脆弱性和增长潜力研究 / 米子川著.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4.4

(山西财经大学学术文库)

ISBN 978 - 7 - 5095 - 5392 - 3

I. ① 中… II. ① 米… III. ① 就业—研究—中国 IV. ① D66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85650 号

责任编辑: 肖 蕾

责任校对: 周秀荣

封面设计: 张立娟

版式设计: 兰 波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URL: <http://ckfz.cfeph.cn>

E-mail: ckfz@cfeph.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政编码: 100142

发行处电话: 010 - 88190406 财经书店电话: 010 - 64033436

北京厚诚则铭印刷科技有限公司印刷

787 × 1092 毫米 16 开 13 印张 211 000 字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 30.00 元

ISBN 978 - 7 - 5095 - 5392 - 3 / F · 436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本社质量投诉电话: 010 - 88190744

打击盗版举报热线: 010 - 88190492、QQ: 634579818

总 序

何谓大学？囊括大典，网罗众学之学府也。大学既是教育机关，也是研究机关。它不仅要传授已有的知识，并且要产生新的知识。办好一所大学，关键在于抓好“五学”，即学科、学术、学者、学生、学风。其中，学科是龙头，它规定了学校发展的资源禀赋，决定了学校建设的质量和空间，而学科建设的关键在于培育一个共生共长、良性运转的学科生态系统。

山西财经大学作为一所多科性财经类大学，确立了“以生态规划布局、以布局凸显优势，以优势凝练方向、以方向组建团队，以团队配置资源、以资源优化生态”的学科建设发展思路，通过挖掘自身的学科优势与特色，准确定位，合理布局，促进学科间的交叉互融、共生共长，努力培育和营造出一个能良性运转和可持续发展的学科生态。

一、以生态规划布局、以布局凸显优势

学科生态这个概念是借助生态学的概念来阐释学科布局的，是指在学科布局上需要注意学科的学术特征和发展习性，将有发展优势的同类学科集聚为学科群落，并带动对优势学科发展起支撑作用的相关学科，构建起交叉互融、共生共长的学科有机体。这就要求我们在学科结构布局上求优，不唯全，扬优扶重，顺势而为，准确捕捉学科发展机遇。

因此，我校建设以经济学、管理学、法学为学科高地，进一步明确了重点学科、重点专业、重点创新平台，以及各个支撑学科与主干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构建具有财经特色的学科生态。这样的布局不仅利于凸显我校学科特色，拓展我校和省内兄弟院校差异化竞争的发展空间，还有利于凸显我校的办学特色，提升财经类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加强服务地方经济建设能力。

二、以优势凝练方向，以方向组建团队

学科研究方向是体现学科优势的落脚点。在学科发展方向的选择上突出建

设重点，注重另辟蹊径，在学习他校成功经验的同时，加强消化、吸收、内化，务求通过创新形成突破，努力形成自身学科优势与特色。有了特色鲜明的研究方向，能否真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学科优势，关键在于学科团队。因此，学校特别重视学科团队建设，将其作为学科建设的主要工作来抓，长期坚持“引进与培养”并重的原则，稳步提升人才队伍的科研素养、学缘结构以及团队协作能力。

三、以团队配置资源，以资源优化生态

有了稳定的学科研究方向和高水平的学科研究团队，就具备了构建良好学科生态的硬件条件，想要收到预期的建设成效，还应合理配置学科资源，优化学科建设外环境。为此，学校将学科建设视为“一把手”工程来抓，通过成立学科群工作组，出台学科建设专项经费管理办法、启动中青年骨干教师提升工程等一系列措施进一步理顺学科管理机制，赋予学科工作组和学科带头人相应人、财、物的调动和支配权，促进学科团队成长和学科资源合理配置。

大学既是教书育人的圣地，又是科学研究的净土；既是社会进步引领者，又是社会发展助推器。我校办学历史悠久、财经特色鲜明，为山西乃至全国输出了大量高水平优秀人才，为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建设不遗余力。面对当前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势，学校确定了由教学型大学向教学研究型大学转型的发展战略，坚持走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之路。组织出版《山西财经大学学术文库》不仅是对学校60多年学术文化和学术传统的历史性继承，也是学校在战略发展阶段所采取的重要举措。

本套学术文库是我校骨干教师的代表性学术成果，凝聚了作者们多年的研究心血，体现了我校的研究特色和学科优势。我们希望以此为契机，秉承“修德立信、博学求真”的校训，弘扬“明礼诚信、艰苦创业”的晋商精神，促进学校学科建设水平再上一个新台阶。

校长：邵泽光

2013年12月

前 言

就业，从来都是人类繁荣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的宏大叙事。

2013年9月5日，俄罗斯圣彼得堡。20国集团领导人第八次峰会又一次将目光聚焦到就业问题上，大会主题就是促进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岗位。同时，峰会还将从刺激投资、确保市场信心和透明度、提高调控效果等三方面入手展开讨论。之前的9月3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指出，就业疲软、全球经济低迷和失衡表明了结构性政策的重要性，他们认为结构性政策会创造就业、带来增长、减轻财务和永久性地减少外部失衡。（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盖伊·莱德（Guy. Ryder）指出，目前全球失业人口有2亿人，其中20国集团国家就有9300万人，每个20国集团国家都受到了就业问题的困扰，必须加强内需，促进增长，从而从根本上提振就业。

事实上，就业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影响深远的社会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业增长的研究逐渐从宏观的经济社会领域聚焦到更加微观、个性和充满人文意识的脆弱性视野中。我们相信，就业增长不仅仅是劳动者个人的目的，而是社会发展的理性选择，属于家庭决策行为，是产业结构变动和经济社会进步的最优化选择的结果。

本书研究的逻辑起点是中国在转型发展背景下凸显出的“高增长，低就业”的经济现实，持续走低的就业产出弹性预示着中国就业增长遇到了空前的压力和困局。本书的研究从两个方向展开：一是系统梳理、分析和尝试构建影响就业增长的宏观内生性模型，并进行实证研究；二是聚焦和关注微观的就业脆弱性，以CHNS调查数据为样本，认真地考察和研究了就业增长的微观脆弱性，以及在一个家庭样本内，哪些问题会影响到就业增长的脆弱性，从而影响家庭生存和生活的质量。

第一章，开宗明义地把就业增长作为本书研究的新课题提了出来。本章认真地系统地回顾和总结了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就业增长遇到的问题 and 解决的

基本策略,对我国的就业增长历程进行了认真地回顾和反思,提出了“宏观视野的内生性和微观视角的脆弱性”的双重研究设计,并据此进行了方法选择和创新点构架。

第二章,系统整理了失业统计中的概念和有关就业统计指标的辨析,首次提出有效就业量决定方程,并进行了测算,给出了1978—2010年农村和城镇有效就业量统计数据,为全书的研究和写作打下坚实基础。

第三章,站在宏观经济发展的视野下,系统梳理了20世纪4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经济研究中关于就业增长的研究理论和模型,其中不乏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经典论述与开创性研究。本书沿着就业问题的路径分析,以就业增长为因变量进行了系统梳理,从凯恩斯、哈罗德多玛到索罗,从阿罗到戴蒙德,提出了就业变迁中内生性增长的三条基本道路,也基本上理清了就业增长的动力在于人口增长、投资和资源约束等三大要素。

第四章,以就业增长的脆弱性为微观视角,借助CHNS数据进行了系统的实证分析和研究,率先将脆弱性研究框架导入就业增长的研究方法体系中。这是本书的首创,也是脆弱性框架的拓展性应用。实证研究表明,对于社会弱势群体来说,就业的脆弱性就是潜在的失业风险;就业不仅是一个人的事情,也是一个家庭的事情;就业是低收入家庭摆脱贫困的唯一出路等等。脆弱性帮助我们在微观上建立起就业增长的基本信念。

第五章,以理性预期为出发点,建立计量模型,对就业潜力进行了系统研究和实证分析,以呼应有效就业量的计算和分析。未来的经济增长,势必会依赖就业潜力的兑现和挖掘就业潜能,作用于经济增长活动。

第六章是本书的结论,提出了四个观点,其中包括充分就业优先战略、破解脆弱性难题、内生性增长以及就业优先增长方式的转变,为转型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做出根本性和全局性的策略建议。

就业,本质上还是一个人本主义的问题,关系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仅关乎经济增长,更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因此,本书后续的研究将继续从脆弱性和内生性的双重视角,积极探索和研究社会学意义上的就业难题和就业对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重大意义。

米子川

2013年9月5日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一、选题和研究背景	2
二、关于就业增长经典理论的简要回顾	15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27
四、本书的研究框架和主要内容	29
五、本书的主要创新点	31
六、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33
第二章 统计准备：概念、数据和模型方法	34
一、就业、失业、就业增长及相关统计概念	35
二、有效就业的概念及再认识	41
三、有效就业量的测算模型	42
四、关于有效就业量的估计	44
第三章 宏观视角：就业增长的内生化历程及模型分析	59
一、就业增长模型的内生化历程	59
二、货币政策内生化的就业增长及其例证	65
三、汇率内生化的就业增长研究	90
第四章 微观视角：就业脆弱性研究	116
一、脆弱性的概念及其在不同学科的表现	117
二、就业脆弱性的概念框架	121
三、关于脆弱性的统计测度	124

CONTENTS

一、就业增长潜力研究文献综述	139
二、就业潜力的统计涵义	142
三、我国就业潜力的综合测算	149
四、就业潜力分析的实证研究	159

第六章 结论

173

结论之一：充分就业是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必然选择··	177
结论之二：破解就业增长的微观脆弱性难题	181
结论之三：就业增长的内生化策略	185
结论之四：发掘潜在就业，实施就业优先发展战略	187

参考文献·····	192
-----------	-----

第一章 导 论

我们赖以生存的经济社会的突出问题，是不能提供充分就业和武断而又不公平地分配财富和收入。

——选自《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John Maynard Keynes, 1936)

自 1979 年始，中国经济抖落沉荷，拔地而起，扶摇直上，迈上了快速增长的征途，连续 30 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年均增长速度大体上超过了 10%。高歌猛进的中国宏观经济创造了全球经济史上长时期高速增长的又一个奇迹，可以媲美战后日本、德国和 1965 年独立以后高速发展的新加坡。一个令人振奋的重要标志是，2011 年初，日本公布了该国 2010 年国民生产总值为 5.474 万亿美元，和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同期中国国民生产总值 5.879 万亿美元相比，少了 4050 亿美元。至此，中国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二位。同时，日本从 1968 年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以后，2011 年退居第三位。

然而，盛世之下，隐忧浮现。

从宏观经济发展的四大目标来看，在实现经济增长总目标时，我们收获了国内生产总值盛况空前的增长，但是就业增长出现很大阻碍，连一向保守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指标也依然居高不下，长时间维持在 5% 以上；物价通胀速度又常常高于预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屡次逼近 6% 的严重通胀的警戒线，对居民消费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居民的劳动报酬中，增长的工资收入基本上被物价上涨带来的通胀吞噬；2008 年末的美国金融危机和 2011 年末的欧债困境时，我们的

国际收支均衡目标以及适度的外汇储备政策也受到国际经济的拷问。同时,贫富悬殊不断加剧^①,城乡差距持续拉大,城镇居民消费能力减弱,居民财产及所有者权益增长缓慢。

所有这些问题都和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联系在一起,那就是就业增长。站在中国经济转型发展和主动理性地放慢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的脚步的关键时点,就业当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必须慎重考量和严谨对策的核心问题。

本书旨在回答下述三个问题:

1. 在30多年改革开放与经济发 展的宏伟历程中,我国的就业增长经历了怎样的波折和反复,是什么因素在一直深刻影响、阻碍或推动着就业增长?

2. 面对就业增长的内生性影响和就业市场的外部性冲击,什么原因使得我国的就业增长表现了逐步增长的脆弱性?如何衡量和比较这种脆弱性对就业增长的中长期影响?或者,如何缓解、转移或者完全消除脆弱性带来的就业增长的微观影响和宏观影响?

3. 在就业优先增长的策略背景下,应该推行怎样的政策才能够实现全社会在就业问题上的公共理性或者社会理性,从而减少就业者或就业岗位之间的信息损失和寻找成本?

一、选题和研究背景

就业,乃民生之本,关乎生存、稳定和发展,自古以来就是社会选择和经济发展的最根本的内在动力。无论是站在政治角度还是立足经济现实,实现充分就业都是一个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之一。

中国历来就是一个人口大国,也一直是一个劳动力大国,人力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保持至今。而且,中国的传统文化历来重视劳动就业对于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决定作用。孔子历来主张“君子务本”,即每一个人都应有一份属于自己的本职工作。“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见《论语》),把劳动当做是人的五种美德之一。因此,劳动在政治上成为社会稳定的重要砝码,从道德上成为价值导向的一种美德,从经济上成为民富国强的基本手段。

^① 2011年11月29日,中国政府调整了贫困线标准,由2010年的1274元提高到2300元,已经接近联合国制定的每天1.25美元的标准。根据这个标准,中国有1.28亿人重新进入贫困人口的范畴,与之前的2688万贫困人口的数字形成强烈反差。事实上,如果按照每天2美元的标准,根据温家宝总理的估计,约有1.5亿人口处于这个基准贫困水平之下。目前的这个贫困线,根据国际组织的统计概念,应该被称为“赤贫线”或者“生存线”。(中国贫困线标准接近国际标准,参考消息,201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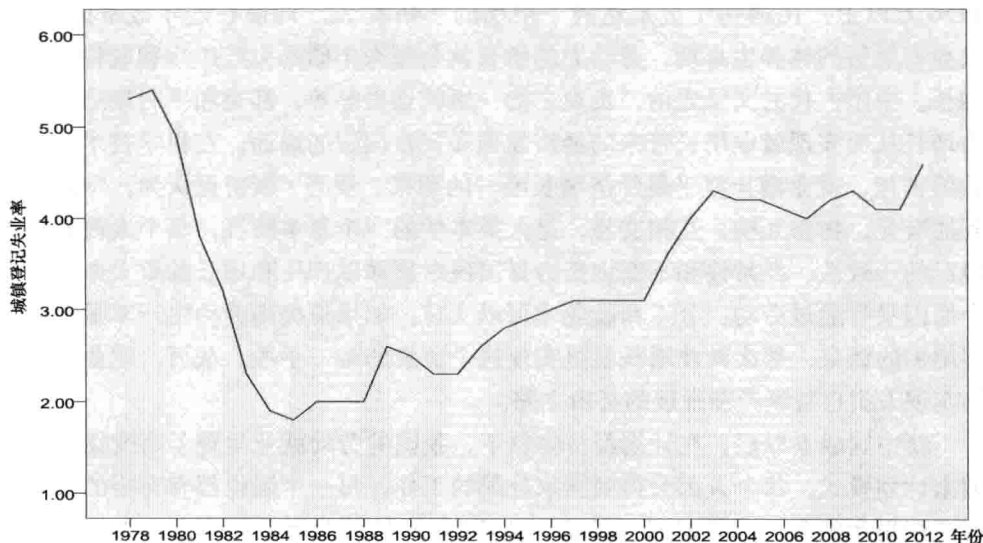
从可以考据的历史时期考察,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我国都要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有更多的劳动力可以参与经济活动。据考证,我国春秋末年的人口已达2150万以上,民国初年更是达到了空前的4.46亿人。即使在连年战乱的古代,只要有短暂的休养生息期,劳动力的增长就会带来丰硕的生产成果和较快的经济增长。中国古代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等,都是和平时期通过劳动力增长从而实现就业增长带来的经济发展和民富国强的局面。在科学技术并不发达的古代,就业增长似乎是经济增长唯一的源泉。亚当·斯密也认为,“经济人”互通有无,物物互换,互相交易,是人类本性的一个基本特征,每个人改善自身境况的一致性、经常性和不断地努力是国民财富赖以产生和增长的重大原因。这个原因只有通过劳动、分工和就业才可以实现。如果说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国民财富增加的源泉,那么就业增长就是实现这个源泉的唯一手段。从而,就业增长也是实现人类自身繁荣和发展的必由之路。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劳动就业呈现了高度集中式的国家计划模式。每个人都会得到国家分配的工作,每一个岗位都有充裕的劳动力资源使用和储备。这段时期(1952~1978年)的就业增长基本上与人口及劳动力的自然增长实现滞后式的同步,只要加上一定的成长期,人口基数乘以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就是劳动力增长率,亦即就业增长率。

1978年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就业增长逐渐由计划模式向市场模式过渡。依照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肯尼斯·阿罗的观点,理性条件下的社会选择,实质上有两种方法,“投票”用于政治决策,“市场”用于经济决策。对于选择对外开放作基本国策的中国来说,劳动力供求的市场化改革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30年后的实践证明,这种大趋势已经得到确立,并逐渐走向成熟。

改革开放30年来,逐步完善的“市场化导向”的就业市场格局大致呈现了“三峰五底,渐行渐远”的增长特征,其关键转折点出现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三个重要时期。第一个节点是1979年开始试点的城市国有企业改革,国企员工的优化组合和下岗再就业带来了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批失业人员,但这个转型时期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仅有1.8%,之后失业率逐渐出现持续增长;第二个节点出现在1992年以后,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标志的经济高速增长期,就业人数大幅度增加,城镇登记失业率降到了2.3%;第三个节点出现在2003年,伴随经济飞速增长,这一年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出现了一个比较显著的峰顶,达到了4.3%。到2009年更是达到了5%左右。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的统计数据,

失业率远高过统计局数据的 5% 左右。也就是说当前国内城镇失业率基本上处于 10% 左右。一些国际组织和研究机构对我国真实失业率的估计更是高过这个水平。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0—2011^①

图 1.1 1978 ~ 2012 年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

在 1985 年以后失业率缓慢而波折地爬升过程中,我们还注意到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即一部分高端劳动者收入成倍增长的同时,更多的初级劳动者和以工资收入为主要收入的劳动者,其收入甚至难以抵御轻微的通货膨胀带来的影响,一些经济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为“跑不赢 GDP 的收入增长”。此外,我们还应注意到 30 年的市场化进程中,逐渐从国有企业、事业或社会其他阶层沉淀出来了一个城市低收入阶层,他们是失业者、半失业者或不断寻找下一个工作机会的求职者,属于这个社会底层的“就业弱势群体”,我们给这个群体定义了很多种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特征,也逐渐推出了多种激励和促进这个人群就业增长的政策和策略,比如“下岗再就业工程”、城市“4050 工程”或“服务创业工程”等等。

在现代西方国家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市场体系中,收入、消费和财产的贫富悬殊主要源于资本、市场竞争、技术创新和财产分配的不公平。在我国

^① 由于 2012 年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数据尚没有统计并公布,本书采用了温家宝总理在第十一届人大第五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 2012 年经济工作的预期目标,即增加 900 万个就业机会,并力争把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4.6% 以内。

现阶段，稳定和有保障的工资性收入是人们参与市场化生存的主要来源。如果导致更大的贫富悬殊和财产的进一步分化，足以说明我国当前的社会现实属于就业增长不足和就业机会不平等。就业增长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必须面对的最重要的战略目标，如何解决好逾 9 亿适龄劳动者的就业问题，是当今中国最重要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是当今重大的国情，是不可逾越的发展之峰。我们相信，正在逐步走向成熟的中国经济有能力提供足够公平和富有效率的就业机会，这也是本书立论的重要支点。

同时，必须注意到，中国正在逐步融入日益开放的国际市场，全球性的失业浪潮正在不断侵扰世界各国。就业问题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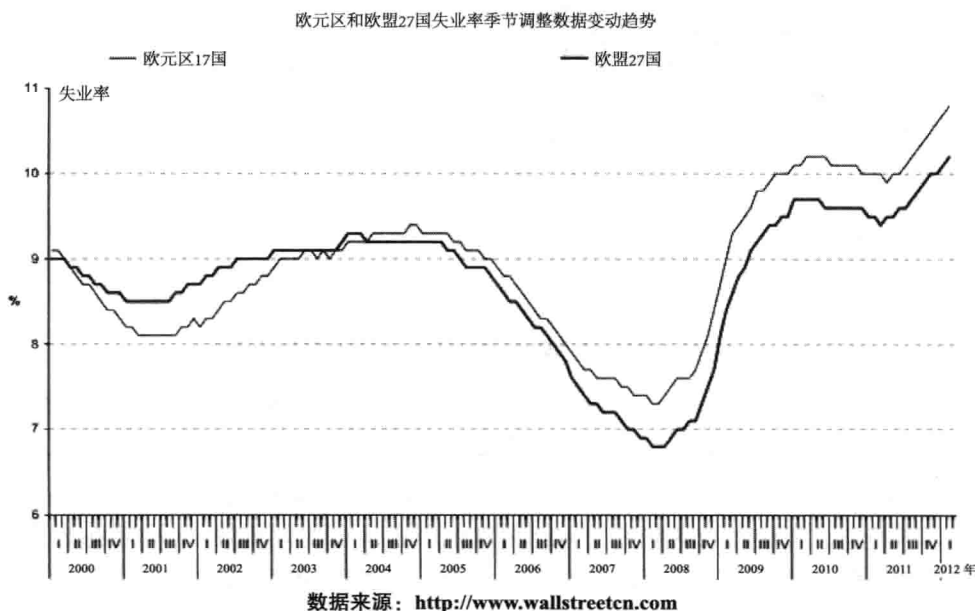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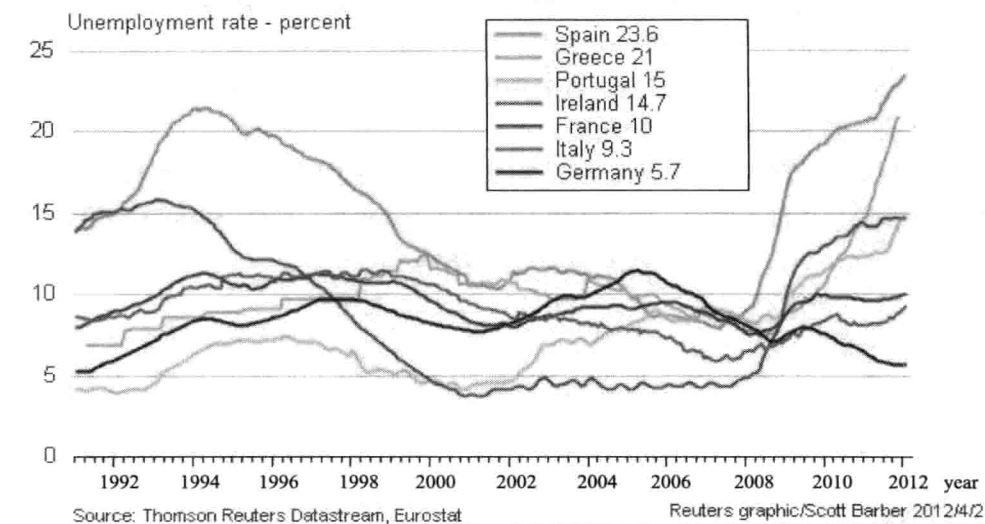


图 1.2 欧盟及欧元区国家 2000 ~ 2012 年失业率变动趋势

图 1.2 显示，2012 年 2 月，欧元区 17 个国家的平均失业率达到了 1997 年 1 月以来的最高点，即创纪录的 10.8%；欧盟国家同时点的平均失业率也达到了空前的 10.2%。欧洲国家正在迎来 2008 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最严重的就业危局。在这一波失业浪潮中，大多数欧洲国家卷入其中，甚至一些老牌发达国家也无奈地陷入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尴尬局面。西班牙的失业率达到了创纪录的 23.6%，希腊为 21%，葡萄牙为 15%，爱尔兰为 14.7%，法国也达到了 10%。而且，在这些国家的

失业人群中,青年占到了很大比重。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显示,全球15~24岁之间的失业青年达到了7500万人^①。种种迹象表明,世界性的就业难题正在席卷全球。

欧元区失业率



数据来源: <http://www.wallstreetcn.com>

图 1.3 2012 年 2 月欧元区主要国家的失业率统计数据

由此,本书的选题再次得以确认,既考虑到宏观经济发展的国际国内背景,也考虑到了劳动者作为社会发展重要力量的社会学价值。对于就业增长这样一个关乎国计民生的宏大叙事,用什么样敬畏和严肃的态度来研究都是必要的。

本书关于就业增长的研究,重点关注两个重大历史性背景:一是我国宏观社会经济长期发展背景下就业增长的现实问题,二是经济统计学关于就业问题的学术探索和方法创新问题。

(一) 数据现实:1978 年以来,我国就业增长严重滞后于经济增长,发展走势分道扬镳,就业增长的动力式微

伴随着中国经济 30 多年的奇迹般增长,以 GDP 为标志的单目标经济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国民生产总值持续快速成长,甚至在 2011 年初开始 GDP 总量超过日本,达到全球第二的水平。这个成就与日益增长的失业率形成二律背反的

^① 转引自美国《TIME》2012 年 4 月 16 日,《第一财经周刊》2012 年第 14 期,2012 年 4 月 16 日,第 52 页,媒体 Point,张扬、周佳蕾编译。

经济效应，也就是说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我们并没有获得同步的就业增长，以及国民收入、消费和财产积累的增长，从而造成了宏观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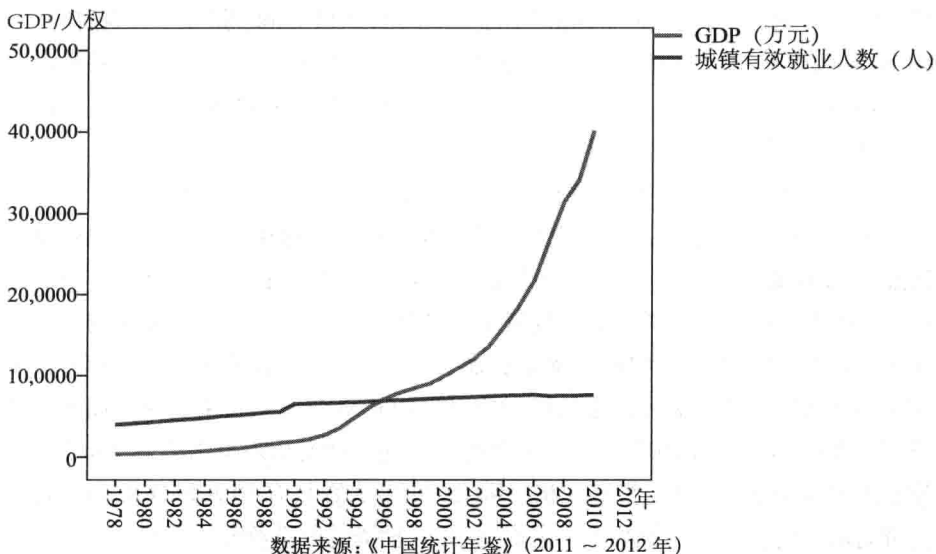


图 1.4 我国高歌猛进的 GDP 和缓慢爬行的城镇有效就业人数自 1992 年后分道扬镳

必须注意到，在中国经济全速发展的过程中，就业增长已经显著地滞后于经济增长的步伐。随着经济转型发展，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源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产业结构升级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对于就业问题，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是，经济发展不断加快，就业反而增长缓慢，就业弹性逐渐走低减。据笔者测算，到 2011 年末，我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不足 0.1，也就是说 GDP 每增加 1%，我们甚至无法收获 80 万个就业岗位和就业机会^①，很多学者对此产生共识。世界银行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迪帕克在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时认为，1978 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 50% 以上来源于劳动力和资本的最初投入，而且全要素生产率的投入约为介于 [30%, 58%] 的区间内，其中包括新产品生产、新技术引进、资源利用率提升和产业结构升级等这些要素的投入带动了中国经济最初的增长和积累。

从图 1.4 可以看出，以 1992 年为分界线，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呈现显著的反向趋势，非一致性和非均衡性骤显，GDP 快速上扬，而就业增长缓慢爬坡，

^①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11》的统计数据，我国 2010 年末的就业人口总数为 76105 万人，经济活动人口为 78388 万人。按照 0.1% 的就业弹性估算，GDP 每增长 1% 所带动的直接就业人口只有 76 万人，激活的经济活动人口约为 78.388 万人，尚不足 80 万人。

就业弹性明显下降，GDP 增长与同期的就业人口增长分道扬镳。据统计，“九五”到“十五”期间，经济增长由 8.6% 上升到 9.5%，而新增就业人口却由 804 万下降到 748 万。此外，就业弹性也由“九五”期间的 0.14 下降到“十五”期间的 0.12，2008 年为 0.08，GDP 每增长 1 个百分点，仅能带动 80 万人就业。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并没有对就业产生多大拉动力，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对就业增长产生了挤出作用，体现了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非一致性和非均衡性。

此外，从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来看，考虑投资就业系数的弹性变化，投资带动就业的能力也越来越差。投资就业系数，是一定时期内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所带来的就业人数增加的指标，等于就业人数增加额比当年固定资产投资额。我们选取 1992 ~ 2012 年数据，分别测算了投资对全部就业的拉动和对城镇就业的拉动，结果显示，1992 年，我国平均投资就业系数（全部）和投资就业系数（城镇）分别为 0.0818 和 0.0676，即 1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将增加 0.0818 万人全部就业，而城镇就业将增加 0.0676 万人；到 2012 年，这两个指标分别下降到 0.0010 万人和 0.0056 万人，也就是说当年每增加 1 亿元投资，相应增加的就业人数只有 10 人和 56 人。从数据看，投资带动就业的弹性已经很小了。纵观 20 年的投资就业系数变化趋势，这个指标逐渐下滑意味着投资对于就业的拉动作用不断弱化，这与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取向有关，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投资对就业的吸附能力不断趋弱，而且城镇的投资就业系数大于全部投资就业系数，这就意味着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劳动力不断向城镇转移，且农村释放出的劳动力大于城镇能够吸收的能力，靠投资拉动的城镇吸纳就业能力也越来越弱。图 1.4 看到，除了 1996 年和 2001 年两次上扬，投资就业系数一直呈现下滑趋势，到 2012 年年末，这个趋势仍然没有阻止，几乎接近 0。

（二）结构掣肘：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严重错位

长期以来，就业一直是我国经济政策的从属性问题，是经济增长的附庸，只要 GDP 有足够优异的表现，同时失业没有成为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就业现实就很少会引起政策的充分关注。毋庸赘言，中国应该把解决就业问题当作一个长期性的战略问题来加以考虑，而不能仅仅当作经济发展的一个从属问题。

1979 年以后的经济增长，主要的动力来自投资、消费和进出口，这些增长同时带动了就业增长，一度时期还呈现出同步增长的印象，逐年计算的就业增长率在 1996 年之前基本等于劳动人口自然增长率，因此失业问题基本上没有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中国虽然有世界上 26% 的劳动人口，但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显然依靠自身的经济增长的奇迹和市场化改革的价值取向，很好地减少了经济增